

# 历史的叙事、评判与信念

## ——兼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何以可能

胡伟希

(清华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084)

**摘要** 所谓“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它的确切含义应是:大凡人类以往的行为与活动,只有经过思想的理性反省以后,才进入历史的视野。也正是在这种意思上说,历史其实与哲学具有同样的性质与意义。而历史反思不同于哲学反思的地方在于:它表现这种反思不是采取概念思辨以及逻辑推理的形式,而是运用具象的语言。这也就是为什么历史在形式上总是采取“讲故事”的形式,而非抽象的议论与逻辑推证的方式。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看,历史其实是认知的科学,具有认知的性质。

**关键词** 历史 历史学 哲学 思想史

当柯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sup>[1]</sup>时,人们感到不解。因为历史就是历史,思想就是思想,思想怎么能代替历史呢?其实,柯林伍德说这话是有深意的。他认为:尽管历史包括人类的一切活动,但只有经过深思熟虑的人类活动,才可以称得上真正的“历史”。因此,在他眼里,有两种历史:“伪历史”与“真历史”。通常人们将以往人类的一切行为,包括吃和睡、恋爱等,都纳入“历史”的视野,但这些都是属于“伪历史”的范围,而只有受人类理性指引的人类活动,才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人类历史。在柯林伍德心目中,属于真正的人类历史的内容有政治史、战争史、经济史、伦理史等,当然,像艺术、科学、宗教、哲学等人类的诸种精神活动也在其中。

我猜想,柯林伍德之所以区分两种历史,并非认为“伪历史”不值得记载下来,而只是认为它的历史价值不如真的历史那么高而已。所谓历史价值,是指以往的历史对于当前或者未来的人们的思想启迪意义。大概对于柯林伍德来说,像吃和睡、恋爱等这类日常事情,即使详细记载下来,也对于人类的自身设计,以及人类的未来筹划于事无补——它们顶多是人类以往行为的“故事”。而故事,通常只是作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而不值得被作为历史学家用来总结人类历史的经验教训的一门“科学”来认真对待的。

果然如此么?这里且不说人类的种种活动,包括吃和睡、恋爱等,无不受人类自身思想的支配,或者说,严格的没有“思想”的人类活动与行为是不存在的,即使承认人可以暂时离开思想的行为与活动,但一旦人们对这些无思想的人类行为与活动进行反思,它们也就纳入了历史的范畴。因此,所谓的历史是什么,不过是人们对于自身以往活动的理性反思而已,而这种理性反思的对象,是既包括人类的有理性的活动,也包括人类的表面上不受理性所支配的行为与活动在内的。

然而,当我这样说的时候,丝毫没有否定“一切历史都是

思想史”这样一个命题的意思,只不过在我看来,它的确切含义应是:大凡人类以往的行为与活动,只有经过思想的理性反省以后,才进入历史的视野。也正是在这种意思上说,历史其实与哲学具有同样的性质与意义。而历史反思不同于哲学反思的地方在于:它表现这种反思不是采取概念思辨以及逻辑推理的形式,而是运用具象的语言。这也就是为什么历史在形式上总是采取“讲故事”的形式,而非采取抽象的议论与逻辑推证的方式。

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看,历史其实是认知的科学,具有认知的性质。历史认知的是什么?这里,我同意柯林伍德所说:历史是关于人性的科学,它的目的是要认识人性。所谓人性不是别的,无非是通过人类的行为与活动体现出来的人的本质属性而已。然而,关于什么是人类的本质属性,这个问题并非那么一目了然。在思想史上,人们常常将仅仅是人才具有而动物不具备的一些特点视之为人的本性,从而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例如,亚里士多德将人概括为“政治的动物”,而中国的儒家则视人是“道德的动物”,等等。这种种关于人的定义,都是从某一角度对于人的特征的提示,并且区分了人与动物的不同之所在。然而,人除了具有与动物可以相区分开来的许多不同特点之外,它究竟也还是自然界中的一个生物种类,也会有其他动物所具有的许多重要特征。比如说,它不仅要与自然界交换能量,而且与其他动物一样处于与其他动物以及同类的生存竞争之中。总之,作为宇宙进化的最高存在者,人既保存着自然物种的自然性,同时也具有其他自然物种不具备的独特性质。这种自然性与非自然性在人身上的统一,假如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人的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统一。因此,康德将人视之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这可以说是关于人的本性的一个较为可取的定义。其中,所谓“有限的”,是指人与其他自然生物体一样,与其他物种及同类处于竞争状态,有生老病死等,

收稿日期 2007-10-18

作者简介 胡伟希(1948—),男,湖北武汉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无逃于自然律 所谓“理性存在”，是指人由于具有理性，它不安于被动地接受自然因果律的安排，而试图运用理性的力量摆脱自然律的控制而追求无限。人类为摆脱自然律的控制而追求无限的活动有种种，按照卡西尔的说法，像科学、宗教、历史、艺术等，都是人类为了追求无限和实现“不朽”的符号化活动形式。

假如这一说法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所谓历史是对人性的认识，其实说的就是人们对于人类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的一种历史性反思。之所以说它是历史性的，乃因为它以以往人类的活动与行为为对象；之所以说它是反思的，是指它要通过这种对象性的思考来揭示出人的本性——有限的理性存在。

然而，要注意的是 所谓历史反思不是单纯的历史描述。任何历史反思虽然都以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具体事件为对象，但历史的描述仅是历史反思得以进行的前提而非结果。历史反思的真正用意在于：它要从一定的学术立场对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件的性质以及意义进行揭示与评价。而从一定学术立场对于历史事件的性质进行评判，就意味着历史反思远不是“价值中立”的，其评判的立场依赖于某种价值观与形而上学的预设，否则我们无法对历史事件的性质作出评价。当然，这种所谓价值论的评价其实又是蕴涵于历史描述之中的。就是说 历史著作往往只是通过对于历史事件的貌似客观的叙述来表达它的价值判断，但这不等于说，历史的叙事可以离开某种价值判断。因此说，所谓“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深刻含义在于：它不仅仅是对于以往发生过的历史事件的理性思考，而且是一种引入了价值观念的理性评判。

这种关于历史书写是对于历史事件进行价值评判的历史观，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关于历史书写必须遵守的“黄金律”。例如，孔子作《春秋》，立意于“使乱臣贼子惧”，其“春秋笔法”一直被后来的儒家称道。亚里士多德也是通过对希腊城邦制度的研究而得出“法治比人治好”这一有价值褒贬的结论的。在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们提倡“历史神义论”，更将历史视之为上帝要在人间实现正义秩序的展现。然而，近代以来，这种历史观却受到来自实证主义史学的强烈挑战。老牌的实证主义者如孔德认为，历史学应当向自然科学看齐，着力于揭示人类社会进化的规律，并且要采取严格的“科学”方法与态度；而后起的实证主义者，如维也纳学派认为，既然历史的书写无法避免历史学家的主观成见与价值诉求，那么历史学就应当被排除于“科学”之外。然而，假如历史学真的离开了价值评判，它将沦至何种地步呢？它要么成为社会科学的附庸，成了某种社会概念或社会科学理论的图解与注释；要么成为像历史博物馆中被零零星星收藏起来的展示人类以往事迹或事态的残砖断瓦。这就从根本上失却了历史学的独立地位与性质。历史学之所以得以存在与有价值，恰恰就在于它对于以往人类活动与发生过的事件所作出的价值评判，而这种价值评判活动又是通过具体的历史叙事得以实现的。这方面，说历史学像科学一样具有科学性，不如说它像哲学以及艺术一样具有人文性更为恰当。这也才是历史之所以作为思想史的意义之所在。所谓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其准确意义应当是：人类以往的活动与行为只有经过历史学家从思想与价值立场

作出评判后，它才成为历史。

然而，这里会出现问题：历史学家们的学术立场与价值立场不一，当说历史书写是历史学家对以往人类活动的价值评判活动时，究竟应当以何种学术立场与价值评判立场作为标准呢？事实上，我们看到，以往人们之所以主张历史书写应当是客观的这一看法，除了是因为受到近代以来实证主义思潮方法论的影响之外，更大的一个问题出在历史学的内部：人们发现，假如引入了价值判断，就会导致历史的书写失却其客观性，从而，历史学有沦为历史学家们表达其主观意见的工具的危险。然而，我们从上面看到，既然历史学是如同哲学以及艺术那样的人文学科中之一，那么，历史学也如同哲学与艺术一样，虽然它们都同样包含着作者的主观价值评判，但在这些不同的历史书写中，却是有着写得好的与写得不那么好的，以及写得坏的历史书写的区别的。

这里所谓好的或坏的、比较好的或比较坏的历史书写之间的区别，不在于它们是否写得“客观”，而在于它们的学术立场与价值立场是否“公允”。如克罗齐与柯林伍德所辨明的那样，任何历史书写都是对于以往发生过的历史事件的解释，这种解释强烈地显示出历史学家个人的主观色彩，并且历史学家的价值立场与“前见”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克罗齐宣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然而，尽管在历史的书写中，作者本人的价值立场无可避免，而且制约着历史的书写，然而，由不同的历史学家写出来的不同历史著作之间，却有着好坏的差别。这种区别是如何造成的呢？或者说，人们读这些历史著作，鉴别其好坏的标准到底在哪里呢？这就是一本历史著作呈现出来的历史正义感。所谓历史正义感，是指历史书写者在面对历史资料，尤其是以往发生过的关涉人类根本是非观念的重大事件时，所表现出来的正义感。比如说，像历史上的战争，向来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历史上任何时代与地区，也会发生过人为的与非人为的灾难，包括瘟疫的流行等，总之，任何民族在任何时期，都会有其苦难。对这些历史上的人类苦难是表达同情还是熟视无睹？在人类的邪恶与正义之间的冲突与战斗中，究竟是站在哪一边？历史学家的这种价值立场不仅强烈地影响着他的历史书写过程，而且必然反映于他的历史叙事之中。而衡量一部历史著作之有价值与否，或者其价值高下，首先是看这种书写所呈现出来的社会关怀与正义感的强度。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章学诚称史家须“才、学、识、德”四者俱备，而“史德”居上。自然，这样说并不否认历史学家在处理具体题材时，有驾驭史料之熟悉与否，以及鉴别史料之正确与否等之差别，但较之“史德”来说，这些具体的史学功夫却是处于从属地位的。换言之，衡量一部历史作品价值之大小，首先是看其学术立场以及价值关怀立场。举例来说，同样是撰写反映二战时期的历史作品，站在反法西斯与同情法西斯的不同立场上，其历史书写的内容，包括史料的组织与鉴别等，必然是大不一样的。而关于抗日战争时期发生的“南京大屠杀”，站在不同的价值立场上，也会有截然不同的历史书写——一个人假如站在替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辩护的立场上讲话的话，哪怕史料斑斑可考，他却也是可以“看不见”南京大屠杀中的惨绝场面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一部历史著作，虽然离不开“客观的”



历史素材,然而,究竟如何组织、运用,甚至鉴别这些素材,却取决于历史学家的“史德”——历史正义感。历史正义感不仅制约着历史学家对于史料的鉴别与运用,尤其影响其对于历史事件的价值评判。而离开了历史评判的历史书写,严格来说不可能是有价值的历史著作,顶多只能是一大堆史料的堆积;而与历史正义感背道而驰的历史书写,则非但不是历史书写,相反只能是对历史的践踏。

有人会说:当我作为一名历史工作者,在进行某种历史书写时,开始时总是先收集材料,并且对材料加以真伪鉴别,然后将这些有用的史料贯通起来形成可以理解的历史,最后才会对这些可以理解的历史作出价值评判,怎么可以在未经过审查史料之前,就会形成对某种历史事件的看法或作出评判呢?应该说,历史学家在对历史上某一个问题的研究之前,不要对这个问题抱有自己的“成见”或者说,对于历史上某个问题的认知结论与评价,应当是来自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之后才有的结论,这个看法是正确的。但说历史学家在对某一个历史上的问题或事件进行研究之前,就会有自己的史学立场与价值评判立场,这同样也是正确的。那么,这两者的区分在哪里呢?这里,要将研究者的对于历史的普遍学术立场以及价值评判立场,与他对于历史上某个具体问题的学术见解以及价值评判态度区分开来。就前者说,历史学家的学术立场与价值评判标准是不变的。例如,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必须对于人间苦难怀有同情心,必须具有正义感,并且要有通过历史书写来抑邪扬正的历史责任感。就后者而言,历史学家对于某个历史上的问题在未研究清楚以前,不要轻易下结论,更不要随意褒扬。看来,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前者是历史的正义感问题,后者是历史研究的实事求是问题。真正有价值与有分量的历史著作,应当是既具有历史正义感,同时又实事求是的,怎么能说坚持了历史正义感会妨碍历史研究的实事求是精神呢?情况只能是:历史学家的历史正义感只会促使他更加实事求是地去研究与书写历史;反过来,历史正义感的缺乏,却会妨碍一个人去实事求是地研究与书写历史,或者会妨碍他去认识历史上某个问题的真相,甚至会让他去歪曲历史。这是我们从历史中所一再看到的事实。

从这里我们看到:所谓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其“思想”的含义首先是评价性的,然后才是认知性的。换言之,所有以历史书写形式呈现出来的历史,其实都经过了历史学家的思想加工,是历史学家运用他头脑中的观念,尤其是经过他的价值与意义观念加工与筛选出来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历史书写与其说是人类以往活动与行为的再现或呈现,不如说是历史学家的思想观念(包括价值观念)的呈现。人类以往的活动与历史事件是多种多样与丰富多彩的,但作为好的历史学家的思想观念——历史正义感,却是异常地单纯,它无非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善恶感而已。这正如荣格心理学的原型理论所指明的:历史正义感其实是一种“原型”,它是异常单纯的东西,但它却必须通过人类以往活动的各种具体形象呈现出来。这话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历史正义感是不变的“底片”,而历史学家的历史著作则是根据这种“底片”冲洗出来的那些形形色色的“照片”。

说历史书写只是历史正义感这张底片冲洗出来的照片,

这丝毫不减少与贬低历史书写的价值。也许,正是由于有那么多的具有历史正义感的历史学家在对于历史日复一日研究,才有了那么多的有分量的历史著作,而且,怀有同样历史正义感的历史学家站在不同的角度来对同一历史事件进行透视,同一历史事件呈现出来的历史正义感才更为真实人与多彩。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总得不断地进行历史书写,甚至对同一个历史事件也会进行不重复的书写的原因所在。

这同时也回答了这么一个问题:人类为什么需要历史?人类之需要历史不仅是为了观照他自己的过去,从而知道人是什么;人类之需要历史,从根本上说,是为了塑造人自身,使人类自身更为完善。如前所述:人从本性上说是有限的理性存在。这种人的本性呈现于历史,也可以说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然而,人类之所以需要历史,不仅仅是为了知道历史上关于人的本性的这一事实,而且还期望着对于人性的改进与完善。人能不能减少其本性中的“魔鬼”成分,而使其人性中“天使”的成分进一步增加,这不取决于历史学家的著作,而且有赖于在历史实践中的人类整体的努力。然而,历史学家的职责却在于:他除了要揭示出历史上呈现出来的人的本然人性之外,而且还要指出人性改良的方向。这不是要求历史学家在历史的书写中为人性增加什么或减少什么,而只是要求他在对历史上的人性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之后,还要从价值观上作出判断。而从价值观上作出评判的唯一标准,就是他的历史正义感。

当卡西尔引证加塞特“人不是一个物,谈论人有本性是不正确的,人并没有本性。……人类生活……不是一种物,没有一种本性,因此我们必须决定用与阐明物质现象根本不同的术语、范畴、概念来思考它”<sup>[2]</sup>这么一段话时,他并非否认人有真实的本性,而是认为人的本性是可以改良的,真正的人性是塑造出来的。而历史学家的历史书写在塑造新的人性方面承担着重要责任。因此,卡西尔要对这段话继续补充以席勒关于“世界历史就是末日的审判”的观点,并且以黑格尔的下面这段话作结:“特殊民族和特殊精神的命运和行为是这些精神的有限性的现象辩证法。从这种辩证法中产生出普遍精神,即无限的世界精神。这种精神在这些命运和行为中,在作为末日审判的世界历史中,行使着它的权利,它的高于一切的权利。世界的历史就是末日的审判,因为它的绝对普遍中,包含着所有特殊的东西——家庭、市民社会和民族——它们成为观念性的东西,成为它的从属的、但是有机的成员。精神的运动就在于把所有这些特殊的形式展示出来。”

历史是否真的像席勒与黑格尔所说的那样是一场“末日审判”,这个问题不得而知。然而,要成为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至少这应该是他的一种信念。真正的有分量、有价值的历史著作,就是历史学家怀着这种信念而写作出来的。或者说,他之所以书写历史,是为了要表白他的这种信念。

#### 参考文献:

- [1][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 [2][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